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评论选

上 册

安 徽 大 学

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评论选

上 册

目 录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	樊 骏 (1)
《鲁迅感志选集》序言·····	瞿秋白 (26)
论鲁迅杂感文学中“社会相”类型形象·····	刘再复 (51)
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	陈 涌 (78)
论阿Q·····	何其芳 (119)
爱情题材的历史性突破·····	沈敏特 (133)
论《野草》的象征主义·····	曾华鹏、李关元 (156)
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周 扬 (178)
论《女神》的艺术风格·····	刘 纳 (186)
《屈原》论·····	田本相 (206)
谢冰心论·····	范伯群、曾华鹏 (237)
郁达夫及其创作散论·····	赵 圆 (269)
郁达夫风格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	许子东 (292)
朱自清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	何以聪 (310)
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	余 蔭 (318)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

樊骏

—

一九二二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最末一节，曾经“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这可能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形成进行历史考察的最初尝试。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革命文学倡导者为了说明自己发起的新的文学运动既是“五四”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又与它有原则的区别，回顾并且评价了“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成仿吾、郭沫若、瞿秋白、鲁迅、茅盾等，都撰文论述过这些问题。一九三五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等，分别为全书和各卷写了长篇导言，对“五四”和第一个十年间的新文学，分门别类地作了系统分析和历史评价。冯雪峰写于四十年代中期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从理论上探讨了“五四”以来尤其是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的经验教训。同样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起，少数高等院校陆续开设新文学研究的课程或讲座，朱自清、周作人、王哲甫、李何林等都讲过这样的内容。他们的讲义大多作为文学史著作出版^①。这些文章和著作，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

不过，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间，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数有限，把它作为一种专业、一门学科看待的人更少，还没有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研究成果也大多散

见于作家作品评论，或者附属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研究中。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尚未从一般的文学批评、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已经直接间接地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启发人们对新文学的发生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二十年代末期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广泛地同我国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开始结合起来，在一些学科中出现了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萌发于这个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有相当一部分远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四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关于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文学的一系列论著的发表，更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所以，虽然胡适的一些主张，比如以文学进化观解释新文学的诞生，把采用白话作为新文学的主要标志等，曾经对一些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结合，应该说开始得相当早，而且具有较大的优势。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得从一开始就与这场革命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的新文学，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教育部于一九五〇年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要课程。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相继出版了几种现代文学史教材。这些著作，留有匆促粗糙的痕迹，存在错误和缺陷，但它们努力遵循《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说明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各书从章节结构的安排到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都能各抒己见，各具特色，显示出思想活跃、大胆探索的局面和比较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短短几年内，就初步形成了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沿用下来的基本格局和范

围，更是一种学术上的建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然而由此开始的，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学本身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从五十年代中期起频繁起来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简单地把学术与政治等同起来的作法，“兴无灭资”的口号等，都直接影响我们的研究工作。一些文学批评、学术讨论也往往为政治声讨所淹没。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反右倾运动……都明显地改变了某些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的评价，有的还因此被人们从文学史上抹掉。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密切。对于现实的文学工作的要求，也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文代大会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上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过来的”^②。我们研究工作中夸大现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成分的错误，也就随之抬头。有的研究者表示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的萌芽、成长和发展作为线索”，说明整个“新文学的发展概况”。有的文学史和文章，以此作为划分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和评论现代作家作品的基本尺度。他们还断定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或者四十年代解放区的人民文艺，已经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了。为了突出这条线索，他们或者把一些革命作家进步作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也视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表现，或者把一些具有反帝反封建倾向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作家作品，排斥于新文学的主流之外。这些都意味着以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衡量现代中国的新文学，从而在实际上否认了它的新

民主主义性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左”的错误。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再批判”和“巴金批判”等，都带有明显的“左”的特点，也都直接波及到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有的文章指出：文艺战线上的这场大辩论，把几十年来文艺上的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脉络弄清楚了，对写文学史有很大帮助。这是理论工作上的重要收获之一，特别希望写文学史的同志研究一下。……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写出较好的现代文学史来。”③从这样的思想出发，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间突击编写出来的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相对地说，冲淡了新文学运动中贯彻始终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而着重渲染反对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因而从整体上模糊了这段文学的实际性质和基本面貌。“左”的倾向渗透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给整个工作造成了混乱和困难。

一九六四年对于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和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孟超等人的批判，很快就扩大到对于三十年代文艺的全盘否定。连早已去世的革命作家叶紫也受到指责——有人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严重的危机”，断言他“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泥坑越陷越深”，“似乎变成了某个陀斯妥耶夫斯基”了。在这以前，革命文学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限于冯雪峰、丁玲等少数几个；这时，进而把更多的革命作家都划到资产阶级一边。“左”的倾向更有新的发展。不过，这次批判运动没有象一九五八年那样唤起重新评价一切的狂热，反而使不少人产生困惑和犹豫，研究工作开始陷入停滞的局面。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

的灾难。不仅三十年代文艺成了“修正正义文艺黑线”的同义语，四十年代解放区作家实践工农兵方向的光辉成果也被说成是这条“黑线”的罪证。绝大多数现代作家都成了“牛鬼蛇神”，绝大部分现代作品都成了“毒草”。“革命大批判”取代了科学研究。“左”的错误的恶性发展，使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终于不能不完全中断。

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左倾”思潮侵蚀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林彪、江青一伙更是百般摧残社会科学研究；比较起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受到的干扰和破坏，应该说是格外严重的。

二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迅速复苏过来——不是简单地恢复到原来的模样，而是进行了新的探索，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整个学科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下面从四个方面作些简短的述评。

一、着重纠正了“左”的错误。过去，人们对于“左”的错误并非完全没有察觉，也试图加以纠正。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认识和改正这种错误，是相当困难的。不过，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常常是：当一种错误发展到了极端，以最完整最充分的形态表现出来时，它的荒谬也就暴露无遗。这时，它就更易于为人们所识别和唾弃。从一九六四年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他们利用原来的“左”的错误，使之恶性发展，到了荒诞不经、矛盾百出的地步。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产生了怀疑，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反省，以致终于认清他们的反动实质和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这些，都孕育着

这门学科的真正转机。“四人帮”一旦垮台，研究工作立即活跃起来，并且一致表现出纠正“左”的错误的强烈愿望。我们是从自己切身的经验教训中，接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路线的。这条路线的提出，又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纠正“左”的错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将它贯彻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

这几年做得最多的，是给许多曾经被粗暴地否定了的或者贬低了的作家，作出新的评价。其中包括情况复杂或者前后变化很大，一再受到斥责的作家，如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等；在历次运动中受到过批判的革命作家，如瞿秋白、田汉、冯雪峰、丁玲、夏衍、胡风、阳翰笙、肖军、艾青、路翎、陈白尘等；在文学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却历来评价不够或者也受到过责难的作家，如巴金、老舍、曹禺、郁达夫等；还有在文学发展中有一定代表性、起过一定作用，却一直为人们冷落的作家，如李金发、戴望舒、张恨水、钱钟书等。我们并不是单纯地推翻原先的论断，代以新的政治结论；而是通过具体充分的分析，比较准确地论证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成就、贡献和影响，给各人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不是那么明显却是更为重要的变化，是重新确认新文学虽然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但就整体和基本倾向而言，它是反帝反封建的，因此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它与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存在原则的区别。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把“本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渐渐写为社会主义文学史了”，“将萌芽的东西写为主体的东西”。明确了这些，认识和对待这段文学也就有了正确的前提和依据。无论在说明整个新文学还是评价具体的作家作品，都不至于再把什么都牵强附会地归诸于社会主义因素而拔高他们，也不至于因

为并非社会主义萌芽而简单地忽视贬低他们，杜绝了种种“左倾”空谈。前面例举的那些作家的重新评价，都是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的。明确了这个问题，为纠正“左”的错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左”的错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不难理解如今的变化对于整个学科发展的深远影响。

二、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左倾”教条主义总是和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总是互为因果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的学风和研究方法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前面提到的有关“左”的错误的许多事例，同时也是主观武断、粗暴简单的产物。这几年，我们依靠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扭转了“左”的倾向。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方法所引起的变化，还从更多的方面给整个研究工作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例如，在一些作家研究、作家评传中，研究者对于这些作家无疑是喜爱推崇的，怀着很大的热情。但论述中，在肯定赞扬他们的同时，并不回避矛盾，而是客观地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有的还通过几十年来的历史检验，从今天的高度对作家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增加了有关分析的历史深度和学术价值。又例如，不久前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研究者摆脱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结合四十年来的文艺实践和社会变迁，肯定了它的巨大意义，也指出了当年就已存在的不足，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它提出的主张今天哪些应该坚持、哪些需要发展，以及如何坚持如何发展等——做到了从现代中国的文学运动的前后发展恰如其分地评价《讲话》的历史地位。这样得出来的结论，比过去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更为普遍的例子是，许多研究者改变了原先那种以作家是否属于左翼、作品是否直接配合革命之类的条条框框，作为衡量他们的唯一标准的作法，注意对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的实际成就和不同贡献进行考察，作出评价。这就能够准确认识和说明研究的对象。应该承认，过去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缺乏科学性，难以令人信服。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没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今的变化，将能普遍地提高研究工作的学术水平。

三、扩大了研究领域，增加了研究课题。长期以来，我们研究的范围是相当狭窄的。比如，就政治倾向而言，集中于革命文学进步文学，很少注意其他倾向的文学；就民族来说，只研究汉族的，即使对于众所周知是出身旗人的老舍，也未曾考察过他和他的作品有无满族的特殊素质，把他完全混同于汉族作家；就创作流派而言，主要研究现实主义作品，其他的（除初期的浪漫主义外）很少涉及；以时期区分，文学革命、“五四”和三十年代文学，探讨得比较多些，抗战爆发以后，尤其是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文学，知之不多；按地区来分，主要限于北京、上海、延安等文化人集中、文学运动活跃的少数几个点，忽略了其他广阔地区，比如从未有人研究过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和东北地区的文学；就文学样式而言，研究小说的比较多，戏剧、诗歌也有一些，而研究散文的寥寥无几；就作家来说，主要集中于一二十个著名作家，其他为数众多的各有特点和成就的作家，除了有的在文学史上提到几句外，几乎无人注意，……原先所研究的，虽然确是这段文学历史的主要内容，但存在着这么多的空白，说明我们的实际工作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名称，还有多么大的距离。这几年来一个重要变化和进展，就是不少同志以勇于探索的创造

精神，在上面提到的欠缺的各个方面，开拓着新的研究领域。

在原先有所触及的范围里，近年来考察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也都有了明显的进展。过去研究创作，主要是逐个剖析作家作品，现在开始注意从整个文学流派、思潮的演变入手，来勾勒文学发展的线索、过程和轮廓。从五十年代起，几乎只讲新文学的民族化，近年来也重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且结合着现代化讨论民族化。在探求中国现代文学与其他文学、文学以外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也有很多新的突破。原先主要研究它如何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学，如今有不少文章论述它所受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过去只提它所受到的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影响，现在也论及与英、法、日等国文学的联系；以前只提社会主义思潮推动了它的发展，近年来也肯定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等思潮在反封建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以往只承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这几年也在寻找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及其他现代派的创作和主张，为促进文学现代化所留下的痕迹。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从各方面吸取了营养，它受到的影响是复杂的、丰富的，它的变革和创造又是深刻的、独特的。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特殊的文学，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学，也有别于外国的现代文学。只有理清这些错综的关系和变化，从它与中外文学、思潮的各方面的联系和对比中，才能真正识别出它的不同于所有那些文学的历史特征，也才能充分说明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文学。这些新的探索和思考，对于整个研究工作，具有明显的思想意义和理论价值。

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从新的角度观察和立论的文章。比如，过去一般只分析作家的政治倾向、社会思想，如

今也顾及他们的美学观点、艺术爱好；以前着眼于作品的主题、题材，主要说明作品的社会内容、思想意义，现在也讨论它的艺术风格、美学成就——即肯定作家是艺术家，文学创作是艺术实践，作品是艺术构思的结晶。因此，开始重视按照创作规律，扣紧作品的艺术特征，并且力图符合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来进行分析。人们努力从作品中发掘出多方面的内涵和意义，包括一些微妙的、往往被人忽视的、属于作家个性特征的东西，从中得到更多的思想启示和艺术享受，并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的教益。

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了过去没有注意的方面，视线也向对象的深处和细微处延伸。这些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不仅填补了许多空白，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历史发展，也能因此比过去理解得更丰满完整，更深入细致。我们的工作正在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四、大规模开展资料的搜集、整理、编写工作。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况同样如此。全国解放以前陈除阿英（钱杏邨）外，几乎很少有人认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资料工作比研究工作显得更为薄弱。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有所变化，开始编选一些资料。但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变幻难测的是非标准，使人们难以顾及和正常进行这项工作。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使一些人轻视资料工作，甚至借口服从“政治需要”而歪曲原始资料的本来面貌。

粉碎“四人帮”以后，资料工作受到高度重视。一九七九年出版了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现代文

学教研室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十八卷，约七百万字。从同一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下，有数十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参加，开始编辑《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其中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三十卷，乙种《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一百五十卷，丙种包括《现代文学期刊索引》、《现代文学总书目》等大型工具书；对“五四”以来六十多年里散见于报刊书籍的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分门别类的搜集整理，总计五六千万字。

在过去，为了避免为自己或者别人树碑立传的嫌疑，关于作家生平、创作和思想的史料十分贫乏。这几年，在茅盾的带动下，撰写回忆录开始成为风气，许多作家撰文回忆自己和别人的文学生涯，各界人士也写了有关作家和文学运动的回忆文章。它们的大量出现，填补了许多有关文学历史、作家作品的史料上的空白，从而丰富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资料。

一般地说，资料工作本身并不是研究工作（当然，不少资料工作需要精密的鉴别、考证和分析，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但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研究，与这里所说的研究工作有所不同），却是后者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过去研究工作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的就与资料不足有关，研究工作的许多空白，首先也在于缺少资料。资料工作受到重视，并有了这样规模的开展，表明尊重历史、从实际出发、广泛占有史料的精神正在形成，也显示出建设发展这门学科的远大眼光和宏伟规划。

这几年的工作成绩自然还可以再列举一些，但仅就上述四个方面，已经可以看到整个研究工作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方法，从内涵到外延，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广度和深度上突破了这门学科原先的格局，并且酝酿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大的发展和提高。

三

从社会背景来看，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没有三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路线，不可能出现上述的变化和进展。它们是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成果，是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从研究工作本身来看，这些变化进展切合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符合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适应了新的形势向这门学科提出的新的要求。它标志着我们经过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摸索，终于走上了坦途。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而且和它所研究的对象中国现代文学一起，几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在旧中国，研究工作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谈不上学科的全面建设。全国解放以后，有个良好的开端，也作了不少工作，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人们顾不上深入规划和全面开展学科的基本建设，特别是那些带有总体性的、需要长期进行的、学术性较强的项目。大量早就应该进行的工作一直耽搁下来。这几年的工作，不少是在进行过去早该完成的工作，是在填补原先的空白，属于学科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任务。只有按照发展科学的需要，使学科在各个方面都完备充实起来，才能切实保证研究工作的学术质量。这就是这些工作的意义。

历史往往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才能为人们充分掌握。经过这样的过程，模糊混沌的可以变得清晰明确；从偶然性中显示出必然性；从杂乱无章的事态中理清内在的相互联系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现象的含义和实质、历史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它们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后果，才会逐渐表现出来。这个过程也可以使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和态度，摆脱一时的错觉、好恶和爱憎，克服这样那样的片面性。在过去，我们的研究受

到现实斗争的干扰，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发生偏颇摇摆，原因固然很多，但和这段文学才成为历史的存在这个事实所具有的限制也是分不开的。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经历了这么多的社会变迁和文学探求，我们今天能够比以往冷静公正地对待这段文学，准确深入地理解这段文学了。这也是取得上述变化和进展的一个客观原因。如今的有些结论，表面看来似乎是重新回到五十年代初期或者更早时候的理解，但只要作些具体细致的对比，不难看出今天的认识要比过去清醒充实，立论也明确有力，有的还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是我们在更好掌握了这段文学历史以后在认识上、理论上的新进展——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进展。

通过实践的教育，通过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的理解，这也是几年来我们研究工作取得显著变化进展的重要原因。过去的不少错误，从主观认识检查，是和我们机械地理解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把历史和现实等同起来、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研究工作分不开的。以评价资产阶级作家为例，列宁早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在“兴无灭资”口号的影响下，我们却没有区别“五四”以来的资产阶级作家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而是根本否认他们有过进步的一面，或者把进步也斥为反动。例如在文学革命中，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周作人主张“人的文学”，虽然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学要求，但从反封建和冲破传统文学的束缚、创建新的民主主义文学的任务来看，仍有积极意义，属于他们“在历史上的进步”的具体表现，与后来的反动行径有明显区别。我们从五十年代

中期起，竭力缩小这些主张的进步作用，后来又进而把它们作为资产阶级文人破坏文学革命的主要罪证。这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没有任何说服力。事实上，承认并且肯定他们最初的进步，并不会影响对于他们后来反动的批判和对于他们的全面评价；反而可以从前后变化的对比中，说明在现代中国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即使最初起过进步作用，也会日趋没落甚至反动。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现在看来，只有这样的叙述和评价，才能比简单地否定他们揭示出更多的真理，才能准确地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体现出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

恩格斯说过：“群众需要有时间 and 机会来发展自己，……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这几年，一些泛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和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的书评，总是把回顾过去和展望今后结合在一起，从过去的错误谈到今后的任务④。我们的工作，也正是在过去曾经发生过明显谬误的方面，出现最大的变化，取得最多的进展。这都表明我们确实是“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的。恩格斯还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尽管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因为严肃地吸取了经验教训，过去的灾难正在今天的进步中得到补偿。

这几年的变化和进展，同时还是对于新的时代要求的回答。社会主义文学面临现代化的任务，“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趣。对外开放，外国文学作品和思潮广泛流传，有些作家感到需要从中吸取艺术技巧以丰富创作的表现能力，现代文学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经过因此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今天的读者和作家普遍重视创作规律、艺

术特征、艺术个性和风格，在艺术上提出更多的要求，研究者也相应地用力从这些方面总结现代文学的成就。我们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回答现实提出的新课题。有位研究者谈到现代讽刺文学时认为：“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年代，一种愤怒斥责的政治讽刺，自然会成为主导的文艺潮流。但是，当斗争逐渐转变得平缓的时候，幽默、机智的笑声，又成为新时代讽刺所应当有的音调”了，只是“鞭挞丑恶的作品”，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多样的美学欣赏需求”；“对于那些不懈地开拓中国当代讽刺新域的人来说，钱钟书的讽刺小说肯定是会使他们极感兴趣的。”⑤他谈的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与人们对于不同类型的讽刺艺术的爱好需要的关系；但同时涉及到时代的变迁与人们的审美要求、艺术趣味变化的联系，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由于过去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一直是在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激烈的年代里进行的，人们注重作家的政治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倾向，集中研究和肯定的是革命作家和富有战斗意义的作品。作为现代文学的主要内容，它们在今后仍然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但那些没有直接卷入政治漩涡的作家，不是正面描写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作品，那些属于艺术范畴的课题。如果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成就，历史上有过一定影响，今天还有借鉴作用的，不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吗？从更多的方面说明现代文学的历史及其成就、经验和教训。正是适应了新时期人们更为多样的历史知识和美学欣赏方面的需求。这样的变化和进展，同样有客观的必然性。

如果以上的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就说明这几年里的变化和进展是正确的，我们的学科正在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